

浙商发展蓝皮书： 浙江创业观察 2018

陈寿灿 项国鹏 等 著

Bluebook of
Development of Zheshang
Report on Zhejiang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浙商发展蓝皮书： 浙江创业观察 2018

陈寿灿 项国鹏 等 著

Bluebook of
Development of Zheshang
Report on Zhejiang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杭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商发展蓝皮书:浙江创业观察 2018 / 陈寿灿等著.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178-3088-7

I. ①浙… II. ①陈… ②项… III. ①创业—研究报告—浙江—2018 IV. ①F279.2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8393 号

浙商发展蓝皮书:浙江创业观察 2018

ZHESHANG FAZHAN LANPISHU:ZHEJIANG CHUANGYE GUANCHA 2018

陈寿灿 项国鹏 等著

责任编辑 谭娟娟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0571-88904980,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宏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61 千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3088-7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目 录

第 1 章 绪 论	001
1.1 浙江创业理论研究	001
1.2 浙商创业的定量与定性分析	008
1.3 浙江创业观察项目的组织实施	019
第 2 章 浙江创业活动的总体状况	022
2.1 浙江创业者比例的总体情况	022
2.2 浙江创业者比例的区域分布	024
2.3 浙江初生创业者和新企业创业者比例及分布情况	026
2.4 浙江创业潜力和创业氛围	029
2.5 结论与讨论	033
第 3 章 浙江创业者创业类型及其相关分析	035
3.1 浙江创业主体	035
3.2 浙江创业动机与创业类型	041
3.3 结论与讨论	047
第 4 章 浙江创业机会、能力与女性创业	050
4.1 浙江创业机会与创业能力的总体状况	050
4.2 浙江女性创业	055
4.3 结论与讨论	060

第 5 章 浙江创业中的创新分析	062
5.1 分析框架	062
5.2 竞争压力与创新资源	064
5.3 创业者创新经验与能力	067
5.4 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情况	077
5.5 结论与展望	082
第 6 章 浙江创业中的社会网络	084
6.1 分析思路	084
6.2 内部创业网络	085
6.3 外部创业网络	091
6.4 结论与展望	100
第 7 章 创业者行为与创业绩效	103
7.1 决策方式	103
7.2 创业认同	112
7.3 自我效能	123
7.4 创业运营绩效	131
7.5 结 论	134
第 8 章 创业与幸福感	137
8.1 工作满意度	138
8.2 工作—生活平衡度	147
8.3 主观幸福感	151
8.4 幸福的宏观环境	160
8.5 结 论	162
参考文献	164
后 记	185

第1章 绪 论

“浙江创业观察”项目是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持续开展的创业调查活动，该调查活动对接全球创业观察分析体系，旨在全面客观地反映浙江创业者的特征。2018年的浙江创业观察是对2016年度项目的继承和发展，期望通过连续性的调查来产生新知。

1.1 浙江创业理论研究

浙商是浙江创业的重要主体。浙商是当代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的一个投资者与经营者群体，是推动浙江经济发展和创造“浙江现象”的主力军（张仁寿等，2006）。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经济培育成为经济发展主题，浙商也相应地需要承担起新的使命和责任。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学者对浙商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文阐述的四个方面，从中折射出的浙商研究的三个问题值得实践界和学界给予更多关注。一是浙商精神如何与时俱进。随着浙商群体从一代向二代、三代群体演进，以往“发现机会”式的创业越来越多地转向“创造机会”式创业，这对企业家精神的要求与之前完全不同。因此，浙商群体、社会和政府都应赋予浙商精神新的内涵。二是浙商企业如何与时俱进。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动荡，在此背景下，跨界、融合等

成为产业发展主题，大量集中于实体产业的浙商该如何应对这一转型？三是浙商的社会责任如何与时俱进。进入新时代，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浙商作为当下中国最大商帮，理应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同时社会责任的内涵也在转变，时代更需要的是基于商业逻辑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社会创新创业。

1.1.1 新时代浙商精神与文化研究

浙商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创新的群体，浙商精神及其文化传统具有世界意义（陈寿灿，2018）。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视为企业成长的核心基因，浙江民营企业发展依靠的也正是浙商的企业家精神。长期以来，“四千精神”“三板精神”深深地融入了浙商群体的血液，它体现了老一代浙商敢闯敢试、敢想敢做、敢冒风险、敢于吃苦、敢于拼搏和敢于作为的魄力和勇气。“四千精神”的具体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王永昌，2018），因此，进入新时代后，浙商精神需在“四千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概化和升华。2017年11月10日，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车俊提出了新时代浙商精神，并将其概括为六个维度：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兴业报国的担当精神，开放大气的合作精神，诚信守法的法治精神和追求卓越的奋斗精神。范柏乃等（2018）认为，浙商精神是浙江企业家群体在长期生产经营和创新创业过程中积累沉淀的知识、经验、能力、意志、道德和情操等的有效集成，新时代也赋予了浙商精神新的内涵，其主要体现为诚信精神、坚韧精神、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和担当精神等五种精神。新时代的浙商精神继承了过去的“四千精神”，体现了新时代对浙商创新创业的新要求。

在理论层面，学者对新时代的浙商精神及文化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要想实现精神与文化的协同，就需要提升浙商群体的整

体受教育水平。然而,浙商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不高,与浙江经济的活力实力形成鲜明反差。据调查,浙商群体的受教育水平落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的平均水平,各项指标均排在前十名以外。因此,要从文化层面提高浙商群体的竞争水平,实现企业家精神的演进及与文化的协同,就需要在学习机制、知识结构、决策模式等方面进行有机更新(杨轶清,2015)。提升浙商群体受教育水平是一项长期工程,在此过程中需重视创业教育对创业者实践的重要影响,着力打造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强化“三创合一”的系统创业教育新模式,打造优势学科与创业教育相结合的特色创业教育等,以对当前的创业教育进行改进(郑刚等,2017)。可以肯定的是,浙商的企业家精神演进需要与浙江文化相协同,需要与时俱进地秉持浙商精神(陈立旭,2017)。

此外,在浙商精神及文化品牌的构建过程中,新媒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居然(2017)着眼于组织传播在我国的发展,以浙商企业及浙江企业文化为数据收集基础,采用了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立足于组织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两个不同方向展开一系列的学术讨论,总结出新媒体对我国组织传播学发展所起到的影响。李文冰(2018)通过对浙商报道议程设置、框架建构及话语策略进行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浙商通过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不断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逐步走向中国经济社会舞台的中心。浙商媒介形象是多元力量共同建构和叠加呈现的结果,其标示出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媒介形象呈现的社会语境。总体而言,进入新时代,浙商区域品牌的内涵和品牌构建能力都需要再提升(池仁勇等,2017)。

1.1.2 浙商战略转型与路径选择研究

进入新时代,浙商企业的发展面临新兴技术不断涌现、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等多方面的严峻挑战,战略转型迫在眉睫。然

而，浙商企业在制造业领域仍主要以模仿创新为主，转型困难。基于此现实问题，浙商创业创新的战略路径与选择问题就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浙商创业创新的战略路径选择集中在制度创业、平台创业、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以构建与优化适合浙商战略转型的开放环境为重点（黄先海等，2015）。具体而言，在浙商创业创新生态系统中，制度变革是支撑，这不仅需要来自政府的顶层设计所推动的“自上而下”式的制度变革，同时也需要浙商开展“自下而上”式的制度变革；平台创业是抓手，这需要有效沟通双边或多边市场，通过网络效应逐步推进平台的有效打造；基于满足客户需求的商业模式创新是核心逻辑，因为只有实现多方共赢，创造价值，才能够真正实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项国鹏等，2015）。

“互联网+”背景下的企业创业大量发生在政策管制强的传统行业，企业需要依靠自身的战略行动突破已有制度的约束。企业家通过开创一种从无到有的制度而形成的制度创业即被认为是开拓型制度创业，以阿里巴巴电商模式为典型代表的开拓型制度创业实践对于开拓型制度创业机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项国鹏等（2017）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提炼出阿里巴巴制度创业面临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创业约束、所使用的制度创业策略及所获取的制度创业合法化等结论，并构建出阿里巴巴制度创业机制模型，为浙商创业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理论支撑。蔡宁等（2017）提出，制度压力下的企业创业存在“嵌入”与“能动”两种不同的战略选择，并以“滴滴出行”在城市交通行业的创业为例，在区分企业层（业务选择）和业务层（业务发展）面对的不同制度压力的基础上，阐述如何进行战略路径选择。

目前，如众创空间、特色小镇等创业平台有效地辅助了创业实践。王节祥等（2016）通过梳理孵化器和平台研究的文献，阐释了众创空间的本质内涵，并以阿里百川为例明晰了众创空间双边创新型平台的定位，揭示了众创空间发展策略的“基础架构—网络效

应一生态系统”三个阶段的演进逻辑及各阶段的关键行动选择，为众创空间实践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行动框架，最后从政策层面指出了开展众创空间评价所应遵循的要义。陈凤等（2015）认为，众创空间作为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兴载体，具有无边界、自组织与客户化等创业生态系统特征。他以杭州梦想小镇众创空间为例，阐释众创空间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特征与功能，将众创空间创业生态系统结构化为众创精神、创客生态圈、资源生态圈及基础平台与创业政策等四个维度，并分析了众创空间创业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代谢、多层次创业网络嵌套、异构创业资源整合、创业能力建构及用户价值创造等五个核心机制。从更大的宏观层面看，在浙江兴起的特色小镇也是一种平台型产业组织，浙商企业战略转型时应对其予以重视（盛世豪等，2016），因为这一产业组织或将成为中国协同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的有效模式。

商业模式创新是浙商战略转型的有效方式。徐蕾（2015）从“设计驱动型创新”范畴提出了一个特殊的研究视角，并在这个视角下分析商业模式演化的动力、路径和相应的障碍及策略设计等重要问题。项国鹏等（2015）动态考察了商业模式演化机制。其基于价值创造视角，选取浙商龙头企业浙江物产进行纵向案例研究，分析了浙江物产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商业模式要素变化及商业模式演进情况。此外，他们还指出，时代的发展要求浙商超越本企业的视角，通过异地投资、异地创业等商业模式创新“走出去”。潘文安（2015）以238家总部设在浙江赴异地投资的中小企业为实证对象，探讨进入模式、区域产业环境及经营特性对浙商在国内异地市场经营绩效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进入异地市场时，在综合绩效上以多数股权的表现最好；区域产业环境和企业经营特性对异地经营绩效存在显著性影响；中小企业进行异地投资更应选择具有供应链优势、成本优势或营销密集度优势的产业环境，同时提升自身的控制能力和营销能力，从而获得更佳的绩效表现。李文博（2017）紧紧围绕浙商对非洲的创业行为，深入解答

了浙商对非洲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行为的模式类属及怎样促进浙商对非洲创业行为的持续进行。上述成果提出了浙商创业战略转型的方式方法，丰富了浙商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并为企业管理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理论指导。

1.1.3 浙商政治行为与公共政策研究

在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的新时代，浙商的政治参与将在企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魏江等（2017）通过对万向集团的分析指出，企业战略的内在逻辑本源是对合法性的考察，战略行为与政治行为间存在着某种关联。目前，学界对于浙商政治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浙商政治心理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政治参与动机及影响因素、政治行为的主要特征等方面。关于浙商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的关系的实证检验得出：浙商的政治心理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政治参与行为较多，但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浙商的政治功效感较强，但政治理解能力与政治认知能力不强。政治满意度和政治信任感及政治情感对浙商的政治行为有显著影响。政治态度、政治满意度、政治认知、政治信任感、政治情感和背景因素对政治参与行为和功效感的影响程度依次变强（姚丽霞，2013）。浙商政治参与动机现阶段以壮大企业为主，但政治性目的日益显著，公益性和社会责任感日趋增强；而影响浙商政治参与动机的外部激励因素首先是制度激励，其次是社会激励和利益激励。因此，为了有效地引导浙商的政治参与，一方面，应该引导浙商正确对待利益获得对其参政行为和企业运营的影响；另一方面，应该完善浙商政治参与机制，畅通参与渠道，提供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姚丽霞，2015）。

此外，王春福（2018）对以浙商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主要涉及浙商政治行为的主要特征、内在影响因素、战略设计、策略选择、企业价值、社会效应、有效

性分析及公共政策，重点对浙商政治行为同公共政策合理性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为提升浙商政治行为的规范性和公共政策的合理性，需要构建一个政府、企业和社会“三赢”的治理机制。这一研究无论对浙商自身的发展，还是对有效地发挥公共政策的作用都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初以来，浙江以最大的决心，全面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各地、各部门都把“互联网+”技术作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必备要素，通过推进政务标准化，促进不同部门、不同层级和不同区域政府的数据共享，形成了整体性政府的改革模式，在提高行政效率、克服审批制度改革怪圈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新时代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郁建兴等，2018）。此时，浙商企业的行为应与最新的政府改革举措相联结，把握政府“最多跑一次”改革（何显明等，2018）和改善营商环境的契机，进一步扩大自身发展空间。

1.1.4 浙商传承及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学界的相关研究指出，浙商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自身传承与社会责任趋重的两难困境。基于此，一方面，实现（浙江）家族企业传承与代际创业的有效路径是新时代浙商研究的重要主题（陈凌等，2017）；另一方面，第二代浙商的价值观与企业社会责任也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

近几年学界才开始将创业引入家族企业的研究范畴，因此对于浙商传承与代际创业的研究十分有限，相关的概念界定和理论框架尚待持续完善。“代际创业”是指家族企业的继承者不甘于被动地接受传承人的安排，而根据个人能力和市场变化进行创业活动，通过创立新企业等方式追求代际财富积累的一种创新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家族企业是一种特殊的创业组织。家族后代企业家并不是仅仅依赖家族现有资源进行创业成长的个体，在他们的创业

学习路径中，“家族主义”的色彩正在逐渐被淡化，家族以外的“专业主义”的要求正在不断地加强。为解决家族传承困境，一方面，从家族自身角度看，在跨代际发展的家族和企业中，家族后代需要在不同的阶段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这既能帮助家族企业获得响应市场的能力，也是其适应制度变化的重要手段（陈文婷，2013）。另一方面，从外部制度来看，为促进家族企业成功传承和持续成长，我国相关部门应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信用制度，引导家族企业内部管理团队的构建，保障家族企业财产的整体性继承并尽早制订家族企业继任计划等（余向前，2010）。

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提升企业绩效，即在企业内部，发挥组织学习的内驱作用，可促使员工认同企业价值观，认同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自觉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施放等，2015）。目前，浙江民营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在逐渐提高，整体上第二代浙商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有较高的认知。比较而言，浙商对法律责任的认知最高，对慈善责任的认知较低。持有正义感、关心弱势群体、爱好世界和平、重视环境保护和追求影响力的第二代浙商较认可企业获利和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两者兼有的观点；对权威较看重的第二代浙商对追求企业利润比较重视，但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未有显著偏好；第二代浙商对财富的看重尽管可促进其对企业利润的追求，但也易导致其忽视社会责任的履行（杨卫忠等，2017）。

1.2 浙商创业的定量与定性分析

1.2.1 定量分析

浙商已经历经 30 多年的创业实践，因而其规模、体系和环境

已经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和优化，浙江在全国范围内属于创业活跃省份。“十二五”以来，以创业带动就业成为浙江全省经济和就业新的增长点（童素娟，2015）。浙江的个体工商户总数、私营企业总数及每万人市场主体拥有量均居全国前列。潘家栋等（2017）提出，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和优势，也是浙江的金字招牌。

（1）浙江创业水平情况

为了更好地评价浙江创业的情况，主要通过个体和组织 2 个维度建立区域创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比较各地区的创业数量和质量（张钢等，2009；齐玮娜，2005）。这里借鉴区域创业水平的相关研究，形成浙江创业水平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 1-1 所示。

表 1-1 2015—2016 年浙江创业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性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2015 年	2016 年
创业数量水平	个体	数量	个体就业人数(万人)	466.6	519.6
		频率	个体就业人数占劳动人口比例(%)	11.2	12.4
		活力	个体就业人数增长率(%)	—	11.4
	组织	数量	私营企业数量(万家)	104.7	119.5
			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万人)	1692.8	1765.4
		频率	私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数量比例(%)	88.0	91.4
			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就业人口比例(%)	45.3	47.0
		活力	私营企业数量增长率(%)	—	14.2
			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增长率(%)	—	4.3

续 表

指标性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2015 年	2016 年
创业质量水平	创新性绩效	区域知识创造水平	每万名就业人员研发人力投入(人)	98.3	100.3
			研发经费投入(亿元)	1011.2	1130.6
			每万人专利拥有量(项)	42.4	39.6
		区域知识流动水平	技术交易额(亿元)	98.1	198.4
		企业创新水平	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率(%)	30.6	32.1
	规模性绩效	企业投资绩效	私营个体经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	3.5	3.8
		企业生产绩效	私营工业企业人均销售收入(万元)	72.5	76.0
			私营工业企业总产值占 GDP 比重(%)	64.8	60.1
			计算机及信息产业总产值占 GDP 比重(%)	3.9	4.7
	创业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	每万人中大学生在校人数(人)	190.4	190.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2016)、《浙江省统计年鉴》(2015—2016)。

(2) 创业质量

从表 1-1 可知，2015—2016 年浙江省整体创业活动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从创业数量角度看，2015—2016 年个体和组织层面的数量、频率和活力都稳步上升。从个体层面来看，2015—2016 年，个体就业人数增加了 53 万人，增长率为 11.4%。从组织层面来看，2016 年新增私营企业 14.8 万家，增长率达到 14.1%；私营企业就业人数新增 72.6 万人，增长率达到 4.3%，私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数量比例达到了 91.4%，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就业人口比例也在逐年增加。整体来看，浙江创业活动仍保持着良好的活力和发展态势。

从创业质量角度看，每万名就业人员研发人力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逐年上升，但每万人专利拥有量略有下降，可见，区域知识创造水平在不断提高。在区域知识流动水平上，2016 年的技术交易

额相较 2015 年有了大幅提升,这说明技术这种特殊的商品,在市场上得到了更高效的配置。2016 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率提高了 1.5%,这说明企业创新水平正逐年上升,但是横向比较来看,浙江省的研发投入力度和创新力度还需要加强。

从表 1-2 可知,浙江省在研发经费投入上与江苏省和广东省有较大差距,浙江省的研发经费支出为 1130.6 亿元,而江苏和广东都超过 2000 亿元。在长三角及珠三角经济区域中,浙江省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排名靠后,上海达到 3.8%,江苏为 2.7%,广东为 2.6%,浙江仅为 2.4%。因此,作为引领中国发展的商帮——浙商,如何把科技创新和真正的技术投入化为面向明天的创新力量,是当下最需要考虑的事(魏江,2018)。

表 1-2 2016 年各省市研发经费及强度对比

地区 指标	浙江	江苏	上海	广东	全国
研发经费支出(亿元)	1130.6	2026.9	1049.3	2035.1	15676.7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2.4	2.7	3.8	2.6	2.1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6)。

从规模性绩效角度看,私营个体经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私营工业企业人均销售收入都在逐年上升,但私营工业企业总产值占 GDP 比重有所下降。综上可以看出,浙江私营企业的发展态势较为稳定,且结构在不断优化。

(3) 影响创业水平的因素

创业活动是一个基于微观决策并嵌入区域环境的动态过程,会受到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果区域内缺乏一个好的有利于创业的环境,即使区域内存在一个良好的创业机会,也不利于新企业的建立和成长(Audretsch et al., 2008)。综上可以看出,环境因素对于区域创业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全球创业观察^① 2017/2018

① 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

中国报告》提出，从金融支持、研发开发转移、商业和专业基础设施等 9 个方面来评价创业环境。我国学者夏维力等（2017）梳理了影响创业环境的六类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基础、基础设施、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创业水平和创新链接。

由于我国区域创业水平参差不齐，根据以上研究，本书将通过经济水平、研发活动和金融市场这三个方面来简要分析浙江创业水平。

第一，经济水平。

研究发现，人均 GDP 收入水平与总体创业质量、创新性质量和规模性质量均为显著正相关关系（齐玮娜等，2015）。浙江省 2015 年人均 GDP 为 77 644 元，2016 年人均 GDP 为 84 916 元，全国 2016 年人均 GDP 为 53 980 元。可见，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有着非常优良的环境孕育创业机会；同时，较高的经济产出和增速，意味着市场规模和潜力的扩大，区域间经济交流密度的提高，这将会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Gries et al., 2009）。

第二，研发活动。

研发的投入和产出代表了区域创造新知识的潜力和能力（Audretsch et al., 2008）。根据知识溢出创业理论，研发活动不仅可通过知识溢出内生高质量的创业机会，还是提高企业吸收新知识能力的必要保证（Block et al., 2013）。浙江省虽然是民营经济大省，但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没有进行新产品开发，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主要产业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水平较低，且缺少核心技术和重要专利（章铁勇等，2017）。在面对如今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浙江民营企业应该思考如何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寻求高质量发展与保持浙江特色之间的平衡。

第三，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作为创业活动的基础，会对创业融资和创业规模产生较大影响。2015 年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变得比较严峻和复杂，金融风险增加导致融资难度提高，这对于浙江民营企业来说是